

从中美两国战略文化的差异看国家安全观的不同

周 学 益

[摘 要] 中美两国历史传统、发展沿革、文化传统、地理与战略环境及民族性格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可以从战略理念、战略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等层次上得到鲜明的反映,并导致两国国家安全观的截然不同。

[关键词] 中国;美国;战略文化;国家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9)06-0843-03

所谓战略文化,就是“国家在运用战略手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持久的、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与习惯性的行为模式”^[1](第 10, 11 页),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涉及其安全及根本利益时而采取的特定战略反应与行为模式。中美两国在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地理与战略环境方面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必然在其国家安全观上得到鲜明的反映。

(一)中美两国战略文化的明显差异

1. 中国战略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儒家的天下情怀与道德理性是中国战略文化中的强势传统,对中国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行为产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1)突出的天下情怀和鲜明的道德意识是中国战略文化中的基石。中国战略文化中的天下情怀与道德理性,“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构成了中国战略文化的原生形态;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说,构成了中国战略文化的深层结构。它所代表的文化发展方向,在儒家那里得到了延续与发扬光大,并由一种文化偏好最终发展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文化精神。”^[1](第 28, 29 页)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达的普遍王权的观念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强烈的普遍王权意识里,以王权为核心的天下秩序就是“王”所认知并有权控制的,并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天下秩序。这种世界认知的倾向,显然是以协调与整合内部的社会秩序为出发点的。为此,“守天下”与“取天下”的较量,都是在解决以自己为中心的普遍权力的合法化的稳固基础。“不求助于合法化的情况下,没有一种政治系统能够保证大众持久性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的遵从。”^[2](第 186 页)这种合法化的基础构建过程,道德的思索并理性升华,不仅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使这种道德主义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成为中国战略文化中的强传统。(2)非暴力与非扩张在中国战略文化中是主导倾向。中国战略文化是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里形成的,而潜心耕作的农耕文明,无需依赖外部,也就难以产生对外扩张的动机。(3)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战略文化中,强烈的道义意识与责任意识是其基本内容。“从意识形态与现实基础来说,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文化无疑更多地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基本实践经验。”^[1](第 210 页)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从西方文化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些具有世界性的人类道义的价值观念,并和中国战略文化中的道德主义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对强权主义进行强烈的道德抨击,对独立、平等以及公正而合理的国际秩序进行强烈的道义追求,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国际正义与反对强权政治为内容的现代国际伦理。新中国成立后,独立的对外政策与保持国家安全不仅上升为一种强烈的民族感情和道德意义上的价值准则,更是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最高信念。

2. 美国战略文化的特征及其在外交政策中的体现

“美国战略文化的源头来自欧洲大陆的清教文化,这种文化由清教信徒带到新大陆之后,找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具有很强的民族优越感和地域优越感的美国文化,对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引起了重要的作用。”^[3](第 106 页)“这种以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为价值取向的文化,主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贯穿于美国的全部交往史上。”^[3](第 106 页)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在近代美国人的眼中,扩张则是美利坚民族的天定命运。”^[1](第 52 页)当代美国决策者常常把自己的是非标准带到国际关系中,把其他国家是否接受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衡量文明进步与否的尺度。这种战略文化驱使美

国在国际政治中做出与别国不同的选择,且持续和连贯地在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来。(1)从美国主流价值观看,意识形态在美国战略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无论从美国文明的“本质”看,还是其国家利益所驱使,“意识形态在战略文化中占有突出地位”^[3](第 107 页),并使得意识形态利益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部分。美国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思维方式作用下的战略文化价值取向就是,美国的持久安全取决于民主自由在世界各地的胜利,而民主自由的推广需要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并随时准备诉诸这个力量。为此,美国领导人始终认为,“如果威胁美国意识形态利益的敌人不存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将无从定义,美国也将随之分裂。”^[3](第 105 页)(2)从西方战略文化主要是围绕着多元政治实体的竞争的实质看,竞争中的生存意识僵硬化并膨胀到追求“世界领导”地位,是美国战略文化中的基本倾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战略视野“全球化”的美国人一直重视构建足够的战略纵深,为保持权力、增加权力和显示权力的战略竞争就自然越过大洋,先是太平洋,后是大西洋。当中欧和太平洋西岸比较安全之后,美国的战略半径就前移到了东欧、中亚、中东和南亚。与此同时,不断扩大民主阵营以满足意识形态需求,借口伊斯兰强调真主的主权而非世俗的主权、特别是其实施的集权政治和偏激的意识形态是导致恐怖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其进行制裁。这就是后冷战时代美国以意识形态为先导实行扩张和维持霸权体制的全球战略。

在美国历史演进中,“西方战略文化中的冲突与暴力传统”^[1](第 49 页)与“大国未来的福祉将主要取决于对地球上其他地区的扩张程度”^[4](第 442, 443 页)使其形成了赤裸裸的为侵略、征服与掠夺行为进行辩护的帝国价值观。当代的美国则尽力将自己的意志变成国际规则,并要求各国或者整个国际体系按照这个规则来运行。为了确保以西方的范式与价值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美国总是把其他国家是否接受自己的文化价值作为衡量该国文明进步与否的尺度,这就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成败的标准就是其他国家是否在按照美国模式组建起来的政府的稳定控制之下。

由此可见,中美两国战略文化的差异从其价值取向看是完全不同的:从战略理念上看,美国谋求“领导世界”而中国则庄严承诺“不当头、不称霸”;从战略手段上看,美国谋求“迷信武力扩张”而中国坚持“和为贵”。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国家安全观的截然不同。

(二)中美两国国家安全观的比较与分析

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由于各国地缘政治环境、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诉求与外交哲学等各种因素不同,尤其是对自身安全环境的认知和判断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国家安全观。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观均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地缘政治考量。本文立足于两国战略文化的不同取向对两国的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进行比较分析。

1.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

近代以来,尽管中国经受了百年的耻辱,接受了西方主权平等的观念,但并未接受西方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的征服理念。从新中国成立直至冷战结束,中国一直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但奉行的仍然是防御性安全战略,将生存视为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过分强调国家安全中的军事安全和国防安全不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认为,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已转化为综合国力的较量,与之相适应,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安全,而是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和环境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冷战结束后,中国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在正确把握冷战后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中国坚持了改革开放后在国家安全方面形成的基本认识,同时根据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新情况,江泽民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应该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6](第 108 页)。“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是中国新安全观基本内容的高度概括,彼此相辅相成。互信是新安全观的基础,互利是新安全观的目的,平等是新安全观的保证,协作是新安全观的方式。中国所主张的新安全观有着深刻的内涵:(1)它基于冷战后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是综合性安全观。这种“综合”体现在:一是强调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等在当代国家安全中应是一个有机结合体;二是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应该综合使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宣传等各种手段。(2)在安全威胁的判断上,中国的新安全观认为,国际安全的威胁并非取决于实力差距,而是在于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在于国家所奉行的内外政策。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的政策是世界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3)中国的新安全观认为各国安全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中国一直强调创造一种“双赢”或“多赢”的局面。中国反对那种片面追求自身“绝对安全”,不尊重他国安全利益,甚至谋求对他国的控制和影响的行为,主张摒弃“零和”模式的安全关系。因为安全是各国普遍的安全,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享受平等的安全权利。为此,中国一直坚持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4)中国的新安全观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遵从“国际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 and 经济发展,应该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不断扩大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基础,促进经济的发展”^[5](第 276 页)。中国的新安全观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胡锦涛在第 60 届联大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倡议,则是中国的新安全观这个重大理念的延续,是对话求安全、合作谋发展“共赢”思路的深化,它针对目前

的国际形势和重大矛盾,“特别强调了不同文化、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进行对话和加深理解的迫切性,特别看重保持全球社会、政治和文明形态多样性的必要性”^[3](第17页);它充分注意到南北世界差距扩大的严重后果,要求建立更加充分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一倡议,势必在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

2. 美国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涵

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对外战略的总目标是确立“世界领导”地位,实行的战略方针是加强军事安全、促进经济繁荣和扩大西方式的民主。这种“以维护霸权地位为宗旨,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以外交为手段,积极塑造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5](第35页)的新全球战略,决定了美国冷战后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内容是确保霸权,加强军事安全,促进经济繁荣,传播美国价值观,促进世界“民主化”。其基本内涵为:(1)在安全威胁的判断上,由于美国总是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繁荣以及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最强大的力量”^[4](第256页),必须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才能担当“世界领导者”。因此,它认为: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核扩散、非法移民、环境恶化等问题,既是美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也是影响美国社会稳定的国内安全因素;地区冲突既是美国在全球面临的战略威胁,又是影响美国国内繁荣的国内安全问题。为此,它强调敌对国家任何一个对美国利益有关的问题或方面,都是对美国构成新的安全威胁。(2)在安全手段的运用上,美国“强调外交是手段,军事实力是后盾,用外交手段制定国际规则,再用军事实力来保护这些规则”^[5](第293页),通过外交、军事力量、国际合作、武器控制、军事威慑的综合运用,维护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秩序,以最低代价获得安全利益的最大化。(3)维护传统联盟关系,并对其进行调整与提升,借助联盟体系这种国际资本以谋求世界霸权。(4)单边主义抬头的同时,在对付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时,为应对交通、通讯的全球化,使打击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能够不受地理上的限制,提出进行跨国活动,强调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在处理大国关系上,推行大国平衡战略。但其所希望的均势状态更多的体现出了一种处于超强地位的谋略,是美国治理下的和平。(5)在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维持其在国际安全上的“领导地位”的理念支撑下,美国始终强调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强化美国在国际经济中制定“游戏规则”的主导地位,建立有利于美国繁荣的国际经济秩序,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6)冷战结束后,传播美国价值观从而促进世界“民主化”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新目标。美国这种通过兜售西方价值观从而扩展“全球民主化”来维持其在国际安全上的“领导地位”的做法在冷战结束后被赋予异乎寻常的重要内涵。

[参 考 文 献]

- [1] 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 [2] [德]尤里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 [3] 李慎明、王逸舟:《2006: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 [4] [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5] 从 鹏:《大国安全观比较》,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
- [6] 《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责任编辑 严 真)

Divergence in National Security Viewpoint between China and USA Based on Difference in their Strategic Culture

Zhou Xueyi

(Military Teaching & Research Sec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USA in terms of historical tradition,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cultural tradition, geological and strategic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 disposition, resulting in different levels including strategic concept,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measures for objective realization, which determines a complete national security viewpoint between both countries.

Key words: China; U.S.; strategic culture;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